

against

傅山的交往和應酬

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

增订版

白謙慎



序

惠所臨日真一日山初方外人哉何自忘之萬方內者

千倍矣此年所學可謂而但為

刑考之富屏子言未究于此即矣矣見此書者

先修若友

台下在處為第一類之庇護耳以婚姻皆其後方也

正云其甲相少之禮已二送進為淳子前也矣

正時多富子以圖之其初 至念之口乃在在在在

不

刑考之富子遺口句一言于初尚如 仔細而

不

白謙慎



傅山的交往和应酬

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

增订版

白谦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傅山的应酬和交往：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 / 白谦慎著. 一增订本.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3

ISBN 978-7-5495-7382-0

I. ①傅… II. ①白… III. ①傅山 (1607~1684)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0564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出 品 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马希哲

装帧设计：彭振威

制 作：陈基胜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635mm×960mm 1/16

印张：14.75 字数：134千字 图片：42幅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5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本书由我的三篇长文组成，它们是《傅山与魏一鳌——清初明遗民与仕清汉族官员关系的个案研究》、^[1]《从傅山和戴廷枏的交往论及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修辞问题》、^[2]《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以傅山为例》。^[3]它们发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早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的英文版（2003）和中

[1] 最初发表于《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3期（1996年），95—139页。

[2] 最初发表于《故宫学术季刊》第16卷第4期（1999年夏季），95—133页；第17卷第1期（1999年秋季），137—156页。

[3] “Calligraphy for Negotiating Everyday Life: The Case of Fu Shan (1607–1684),” *Asia Major*, New Series 3, vol. 12, no. 1 (1999): 67–125. 中译本最初发表于范景中、曹意强主编《美术史与观念史》第4辑，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0—149页。后又收入《白谦慎书法论文选》（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10）。胡晓真、王鸿泰主编的《日常生活的论述和实践》（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也收入了本文。

文繁体字版(2005)。2003年,这三篇论文中的前两篇结成《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一书,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由于售罄多年,读者仍有需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决定发行增订新版,书名依旧,但增加了在第三篇论文基础上改写的外篇。三篇论文本有重复,此次增订,尽量删改。但依然有部分内容重复,敬请读者谅解。

2005年《傅山的世界》中文版问世,这三篇论文的部分内容被纳入了《傅山的世界》,但《傅山的世界》和本书依然有诸多不同。《傅山的世界》旨在描述和分析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为叙事流畅,它在吸收我的一些单篇论文的研究成果时,有所取舍。因此,上述三篇论文虽和《傅山的世界》有所重合,但关注的重心不同,也更为具体深入。这是我愿意将本书修订增补再版的主要原因。

本书的上篇利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发现的一些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钩沉辑佚,对傅山和魏一鳌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清政府官员之间的密切交往进行细致的描述,并进而分析清初明遗民和仕清汉族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篇论文和谢正光先生差不多同时发表的一些论文,^[1]是最早关注清初明遗民和仕清汉官交往的研究。近十余年来,明遗民和仕清汉官的研究,

[1] 参见谢正光《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所收有关论文。

有了长足进步，赵园女士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心态的分析、^[1]薛龙春先生关于王铎等仕清汉官在清初的生活状态的研究等，^[2]都推进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知识。由于魏一鳌是研究清初北方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本书采用了大部分可以查找到的资料。此次修订，增加了魏一鳌和河北籍官员梁清标交往的内容。

傅山交往多，应酬也多，他的书法常用于应酬，所以下篇转向应酬书法的讨论。在中国书法的创作和收藏中，应酬书法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在现存的中国古代书法作品、特别是明清以后的作品中，除去书家们的信札、手稿和日课作品，为应酬而书写的作品在数量上多于为适情自娱而创作的作品。傅山一生书写了数量极多的应酬书法并留下许多议论应酬书法的文字，而许多这样的作品和文字又多和他的挚友、清初北方著名收藏家戴廷栻直接有关。下篇即从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入手，引出并探讨中国书法艺术中应酬作品这个艺术社会史的问题。

在中文发表的学术著作中，本文是最早从“应酬”的角度

[1]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 参见薛龙春《论清初贰臣的自我开脱与相互回护——以书家王铎降清为中心》，《艺术学研究》第3辑（2009），252—276页。

讨论艺术的创作、周转、使用的个案研究。^[1]此后柯律格《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2]何炎泉《张瑞图（1570—1641）行草书风之形成与书法应酬》，^[3]吴国豪《足下负书名，安能负书乎？——王铎书法应酬研究》、^[4]柳扬《应酬——社会史视角下的清代士人书法》，^[5]薛龙春《应酬与表演：关于王铎书法创作情境的一项研究》，^[6]都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中国书画中的应酬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柯律格和柳杨的研究引进人类学的礼品理论，何炎泉和薛龙春的研究注重应酬活动和书法技法、创作情景之间的关系。何炎泉认为，张瑞图迅捷而又独特的用笔和书写量剧增有关。薛龙春则指出，某些应酬场景和当众表演更能激发王铎的创作热情，写出精品。这些都说明，“应酬”作为中国书画中一个普遍而又独特（相对于西方艺术）的现象，已经日益引起关注。不过，目前关于应酬书法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明清

[1] 几乎和笔者1999年发表《从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论及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修辞问题》同时，台湾大学石守谦（Shih Shou-ch'ien）教授发表了英文论文“Calligraphy as Gift: Wen Cheng-ming's (1470-1559) Calligraphy and the Formation of Soochow Literati Culture,” in Cary Y. Liu, Dora C.Y. Ching, and Judith G. Smith eds., *Character and Content in Chinese Calligraphy*, Princeton: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9, pp.254-283.

[2] Craig Clunas, *Elegant Debts: The Social Art of Wen Zhengm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3] 见《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9期（2005年9月），134—136页。

[4] 收入邱振中主编《书法与中国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305—319页。

[5] 载莫家良、陈雅飞编，《书海观澜（二）：楹联、帖学、书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香港大学中文大学文物馆，2008年，97—127页。

[6] 见《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29期（2010），157—216页。

两代。出现这一情况有三种可能：一，明清时期的资料相对比较多，个案研究成为可能；二，明清社会的变革使得文人艺术中的应酬现象变多，成为一个更为显著的文化现象；三，明清之际的人们更愿意在文字叙述中来记录应酬。不管情况如何，对宋元乃至更早的应酬现象的观察，将推进我们对明清时期应酬书法的理解。这就使我们格外期待研究其他朝代的相关成果。

在对应酬书法现象的描述和分析之上，我进一步提出这些问题：如果说中国书法中的许多作品是为应酬而作的话，我们还能不能把这些作品看成书法家的“心画”？我们还能不能理解他们的创作动机？这些问题又把我们引向对中国书法艺术中修辞现象的关注。在使用“修辞”这一词时，本篇偏重的是一种说词的字面意义和事实不相一致的一面。当一件书作的主要文本、作者的题跋、他人的题跋、后世的评论都可能存在着言不由衷的“修辞”或是陈陈相因的“套话”时，我们怎样才能理解一个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特别是当中国书法和实用书写常常难以剥离时，所有能够进入收藏的名人字迹是否都能算是“创作”、这些书写是否具有“创作意图”都成为必须先要厘清的问题。自从我提出书法中的“修辞”这一问题后，艺术史界做出的回应并不多，少数古典文学界的学者予以重视，并讨论了文学史上存在的类似问题。^[1] 若要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

[1] 张澜《中国古代类书的文学观念——〈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187页。

深入，实际困难比较大，因为它除了要求我们掌握充分的资料，对研究对象的创作情景、所处时代惯用的语言都相当熟悉外，还需要努力跳出已有的思维习惯所划下的条条框框。虽说研究难度大，但这又是把书法史研究推向深入必须跨越的一个障碍。

本书的外篇是这次增补的主要部分。它最早是1999年3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主办的一个学术讨论会的发言，后来发表在著名的英文汉学杂志 *Asia Major* 上。这篇文章和《从傅山和戴廷枬的交往论及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修辞问题》虽然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复，但侧重点却不同。后者着重讨论应酬书法和修辞的问题，而这篇文章虽然也涉及应酬书法，理论关怀却指向文人艺术家文化资本的建立、积累和运用。

在将《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一文改为本书的外篇《文化资本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时，笔者尽量删去了和下篇重复的部分，并增加了一些新的论述和最近几年出现的新资料。从1992年开始研究傅山，至今已有二十三年。虽说自从2007年为纪念傅山先生诞生四百周年撰写过一篇论文后，这八年来我没有写过关于傅山的论文。但是，对相关研究、出版动态和新发现的资料，我一直予以关注。

2003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傅山的交往和应酬》时，汪世清先生刚在北京去世，我在后记中表达了对他的纪念。当1990年我由政治学转入艺术史后不久，就在耶鲁大学举办的八大山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认识了汪先生，从此在收集资料方面

得到他的指导。在处理古代文献方面，先贤和前辈（特别是乾嘉时期以来的历代学者）早已发展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是中国的艺术史学者应该珍视和继承的学术传统。尽最大的努力收集和考订原始资料，是实实在在地推进我们这个领域走向成熟的最基本要求。正因为如此，2013年7月我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访谈时，专门指出“中国艺术史的研究需要继承传统的治学方法”，记者把这句话作为访谈的标题，因为它代表了我对艺术史研究的基本态度。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有针对性，在我看来，尚有不少国内的艺术史研究者和在海外工作的华人学者，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但是，在同一篇访谈中，我还谈到了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希望中国学者能够比较和借鉴西方理论，通过深入的个案研究来发展中国的艺术史理论。本书便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一部抛砖引玉之作。

2015年7月28日于杭州

目 录

序 / i

上篇 傅山与魏一鳌

- 一、魏一鳌的家世和早年生活 / 4
- 二、魏一鳌在山西任官期间和傅山的交往 / 6
- 三、魏一鳌在“朱衣道人案”中的作用 / 26
- 四、魏一鳌辞官后的生活 / 34
- 五、余论 / 54
- 附录 《丹崖墨翰》简介及释文 / 57

下篇 从傅山和戴廷枏的交往论及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修辞问题

- 一、戴廷枏生平及其与傅山的交往 / 75
- 二、关于傅山书法中的应酬作品问题 / 94

三、中国书法中的修辞问题 / 142

四、余论 / 161

附录 “畏人甚畏虎”

——傅山晚年生活的一个侧面 / 163

外篇 文化资本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

一、建立文化声望：傅山在晚明的生活 / 174

二、日常生活中的书法：傅山书法的各种用途 / 176

三、傅山的交往圈 / 189

四、应酬策略 / 195

五、应酬和社会精英之间的互动 / 207

六、结论 / 218

后 记 / 223

上
篇

傅山与魏一鳌

——清初明遗民与仕清汉族官员关系的个案研究

1654年（顺治甲午），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书法家傅山（字公它、青主，1607—1684/85）因涉嫌参与组织反清活动被捕入狱。在几经刑讯、身陷囹圄近一年后，终以无罪获释。这一事件史称“朱衣道人案”（因傅山为道士，衣朱衣，戴黄冠）。以往史家在解释这一历史事件时，多把傅山的安全获释归结于傅山的友人和弟子的斡旋，以及当时清政府中同情明遗民的汉族官僚如龚鼎孳（1616—1673）等的鼎力相助。^[1]近年来，由于收藏在北京清史档案馆的顺治朝有关“朱衣道人案”的三个题本的披露，使得人们对这一案件的过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2]根据顺治朝刑部的两个题本记载，傅山在生死关头，绝口否认参与反清活动，并请当时山西省布政司经历魏一鳌（约1616—1692）为其作证。显然，魏一鳌这个人物对于傅山的安然获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笔者在研究傅山的生平与艺术时，收集到不少有关傅山与魏一鳌交往的资料，从中发现，在满清入主中原最

[1] 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载《鮑埼亭集》（同治年间刊本），卷二六；瞿源洙《傅寿毛先生传》云：“金陵纪伯紫，合肥尚书龚公救之力，事白得释。”载《傅山全书》第7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061—5062页。

[2] 这三个题本分别是：《河南巡抚亢得时题本》、《刑部尚书任潜等人题本》和《刑部尚书图海等人题本》，见《傅山全书》第7册，5159—5197页。

初的那些年中，魏一鳌曾给困境中的傅山及其友人极大的帮助。傅山和以清初儒学大家孙奇逢（1584—1675）为首的河北学者的交往，也是通过魏一鳌建立的，而傅山和这位友人也保持着终生的友谊。由于傅山的生平事迹已有许多学者做过研究，^[1]魏一鳌却鲜为人知，我这里将着重介绍魏一鳌生平，并从他和傅山的交往来观察傅山在清初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及明遗民和仕清汉族官僚的关系。

一、魏一鳌的家世和早年生活

魏一鳌，字莲陆，别号海翁，由于好饮，自号酒道人。魏一鳌在山西平定州居官时，生活节俭，“每晨进水菜，惟豆腐、白菜、豆芽三种，尝自称三白居士”。^[2]又因其在河南夏峰从孙奇逢问学时曾扫雪亭以居，人又称其雪亭先生。

魏一鳌的祖上本居住在直隶滨州，自七世祖魏得春时，由滨州迁保定。曾祖魏陞时迁新安（即今河北安新县）。魏一鳌的祖父魏朝官是魏陞第三子，父亲魏梁栋为朝官次子，魏一鳌则

[1] 关于傅山的生平，参见郝树侯《傅山传》，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5年；魏宗禹《傅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林鹏《丹崖书论》，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林鹏、姚国瑾编，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第63册《清代：傅山》，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6年；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2] 王余佑《魏海翁传略》，载魏一鳌《雪亭文稿》（国家图书馆藏稿本）。

为梁栋次子。^[1]

关于魏一鳌的生年，由于目前《雪亭先生年谱》尚下落不明，^[2]而无法确知，仅能根据已有的材料来进行一些推测。魏一鳌二十岁中秀才，崇祯壬午（1642）成举人。他与容城李氏三兄弟为友。仲名承光，字恺蕃，崇祯丙子（1636）举人，生于万历庚戌（1610），卒于顺治丙子（1646）。魏一鳌与叔季“幼同砚席”，年纪应相近。^[3]由此可知，魏一鳌的二十岁必在壬午以前，他出生应在庚戌以后，因此，他的生年当在万历辛亥（1611）与天启壬戌（1622）这十二年中。魏一鳌的老师孙奇逢在所撰的《广居轩说》一文中说：“魏子莲陆方强仕之年即以病乞归，名其读书之室曰倦飞，取彭泽知还之意，奉母课子而外无他嗜也。”^[4]“强仕之年”即四十岁的代称，魏一鳌是在1657年辞去忻州太守返回保定的，如果那时他已经四十岁的话，他应该生于1616年左右。

魏一鳌“总角时即端方向学，出入恇谨，不知有嬉戏之事。为文冠其侪，塾师甚重之。童子试，太守李公录取第一，大加称赏。弱冠游泮，壬午举于乡”。^[5]乡试通过后，魏一鳌入京拜

[1] 孙奇逢《新安耆逸魏公墓志铭》，载《雪亭文稿》。

[2] 根据孙殿起先生《贩书偶记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3页）记载，孙先生曾见过陈铤撰《雪亭先生年谱》稿本。此谱很可能仍存世，然笔者至今尚未访得。

[3] 参见魏一鳌《华萼集序》及《临江府司理李公恺蕃暨元配王孺人继阴孺人行状》，见《雪亭文稿》。

[4]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三，清道光二十五年大梁书院刻本。

[5] 王余佑《魏海翁传略》。